

关于社会指标体系的理论思考

谷迎春

本文针对社会指标应用“热”、研究“冷”的现状,集中地思考了社会统计与社会指标的相对区别与联系、社会指标与社会指标体系的相对区别与联系,从三个角度上论证了更应该重视主观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和运用。

作者:谷迎春,男,1942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二战以来,“发展学”日益成为显学。谈发展,总得有可量化的尺度,于是乎,社会指标及其体系也随之热起来。近十几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深化,社会指标和社会指标体系,正在被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在编制社会发展规划中经常而广泛地应用着。它对于明确发展目标、规划社会变迁、进行社会动员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应该说,它的被认可和应用,是中国社会管理的一大进步,是迈向现代化和科学的一种重要标志。

但是,相对于应用而言,人们对它自身的理论研究显得薄弱。应用热,研究“冷”。基于此,谈些个人的思考,以期引起同行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关注。

一、社会指标与社会统计

首先应该承认,社会统计与社会指标二者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操作层面上看,二者确有很多相同之处。

一是说二者均为同一渊源,或者说,在研究的目的、在运用的方法上是一致的。统计学概念先是由德国学者提出来的,据德文最初的含义,它是“关于国情、国势的研究”。如果说,当初这番意思还不是全为人所识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学者发起、有几十个国家学者和社会管理者起而响应的“社会指标运动”就很说明问题了——社会统计也好,社会指标也罢,其目的全在于对国情的一种研究。对国情的研究,可以是历史的借鉴,可以是现象的观察,可以是定性的分析,可以是理论的推导。还有什么方法吗?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其《政治算术》一书中,较为系统地运用数据来说明国情,他对这一方法做如是解释:“我进行这种工作的方法,在目前还是不常见的。因为我不采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语进行思辩式的议论,相反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的问题,只进行诉诸人们的感受的议论,借以考察在自然中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①

二是说二者内容多有交叉、互为表里。从形式上看,一般说来,二者都表现为以数字或数据描述社会现象、社会行为、社会问题量的存在。社会指标的基本形式或者说它的“感觉化”就

① [英]威廉·配第:《政治算术》,商务印书馆1960年中译本,第8页。

② 威廉·配第,引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统计处所编:《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

是数量化,就是社会统计的结果。比如说,关于人口的任何一种数字,总数、城镇人口数、农村人口数、各自的户平均数、性别比例数……在没有进入社会分析、在没有确定它的权数之前,它是社会统计数字,可是一旦它进入上述程序,则变成为社会指标体系数据。可是,尽管有这种性质的变化,但操作者所运用的数字或数据却是同一个。为什么说是多有交叉而不是全部交叉呢?因为不是也不需要所有的社会统计数字全部进入社会指标体系。为什么人们往往会把这二者视为同一呢?从认知角度说,数字或数据它所反映的量的信息,对于社会存在而言“在下述意义上可能是客观的,即它打算表明的是什么状况和正在怎样的变化”^①之时确实是同一个东西。

社会统计是“原生态”的,而社会指标则是经过提炼过的。我说它是原生态,并不是说这种统计没有理论假设,没有操作预设,而是说这种社会统计的原初目的是为当下本职工作或某一项社会管理服务的。事实上,每一个社会组织及其管理部门,几乎每日每月都在进行本部门的工作统计,而那些报表和数据对于其它行业而言,也许是一种游离的,甚至是“互不相干”的社会统计。而社会指标是一种“人为”地社会统计,即它经过了设计者的筛选,把本“不相干”的诸社会统计“编织”起来的社会统计。比如说,对于生活质量的社会指标,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者的设计,应该包括从生活费收入到居民非商品性支出等18项社会统计数据。能不能对这些社会统计进行选择化呢,设计者自己就把它简化为其中最重要的8项。而恩格尔系数就更加简化了,仅为一项!这种简化,本质上是社会统计的世俗化向社会学学理化的一种提升。

社会统计必须是纯数理方法进行,而社会指标的设计必须坚持数理与分析的统一。前一种统计也就是人们常讲的数字的定量分析。这种量的分析,是按照某种固定的历史传统、领域口径、行政规则进行数理运算。它在反映社会运行状态时是直观的、客观的、感性的,也是“权威的”。它是观察宏观社会和微观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材料,它不允许造假、虚报,国家《统计法》的颁布也正是为维护它的客观性、权威性。简而言之,社会统计是社会现象纯客观的量化标准。社会指标的设计或取舍则是从客观到主观的过程,即这种指标的确立是人为的——与时代、与国家、与社会、与民族、与科学、与学者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些因素都是参与其中的。也就是说,社会统计,一旦进入社会指标体系,则从原来的纯客观量化数据进入了主观的被分析状态。

社会指标的确立则必须与分析同时进行。还举生活质量为例。学者们从18项指标中,独独挑选出8项(人均生活费收入、居民消费水平、食品占消费开支比例、人均生活用电量、每百人电话机拥有量、人均住房面积、燃气普及率、非商品支出比重),而把人均消费的肉、油、布等删去了,这种挑选、删减就是一种分析的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吃穿的问题已经解决,据此项分析,吃穿两项没必要再做为社会指标存立。但是,做为一种社会统计,这两项数据是永远需要的。就是动用同一个社会指标,也需要分析。人们都熟知恩格尔系数——这在西方社会学界是很具权威性的生活质量指标、社会现代化的指标。对此能不能不加分析地拿来就用呢?显然不行。中国的城里人,举凡有工作者,他们的一大特征是“单位”所有制——即单位不仅管人的工作,也管人的生活,其中的实物福利工资,对于人们和实际收入而言,是“说也说不清楚”的混沌帐。是故,在运用恩格尔系数时必须虑及于此,否则,

① 威廉·配第,引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统计处所编:《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

你那个调研报告就很可能是缺乏信度和效度。总之,任何一项社会指标的提出、运用必须是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

二、社会指标与社会指标体系

社会指标与社会指标体系都是对社会某一现象的数量衡度,社会指标体系则是两个以上社会现象间互动关系的一种数量表现方式。二者同渊源、同形式、互交叉,它们之间必然地存在相互包容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密切到二者可以互相替代指谓:当人们说社会指标时,也可以理解为是指社会指标体系,反之亦然。简而言之,在操作层面上,人们可以不提出二者相对区别的问题。可是,一深入到理论层面,我以为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它有利于人们认识上的深化和操作上的更加自觉。

社会指标体系区别于社会指标之处,我认为,起码有以下三点。

1. 社会指标体系是对社会指标人为配置的产物,或称是对社会指标多级化处理的结果。人们指称社会指标时,可以是针对社会某一现象、行为、领域中的一种单项数量衡度。比如说人口总数,比如说职工闲暇时间,它们的数量表现当然是“一”,而要讲到人口质量,讲到生活质量,反映这类要求的社会指标则是“多”了。由此,我们可以简化地说,社会指标与社会指标体系之相对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一”后者是“多”。多,从哪里来?又是如何排列?这是社会学理论假设指导下的人为组合配置的结果。有的学者指出“所谓社会指标体系是指,为综合反映和说明社会或某方面的状况而设计的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的社会指标。”为求综合反映而设计的一组指标,显然是人为地配置。而这一组社会指标的内在联系,首先是人们头脑里思维的联系——理论假设。理论假设是主观的,因而也是主动的,但不是随意的。由于它的不同,即或是对同一社会现象的社会指标体系设计,也会形成不尽相同的指标体系。至于在一组社会指标体系内部,则更是明显地体现着理论假设的主动性,这集中表现在对于社会指标的总体设计、项目选择、权数分配等方面。比如说,关于复合指标的设计。面对同一社会学概念的众多涵义,人们可以开列不少社会指标,当然,在这些指标中总有基本的、重要的与非基本的、非重要的,对此做如何的筛选和确认,它最根本的分辨武器就是理论假设。比如说,关于权数的分配,在确定一项社会指标须要进入社会指标体系之后,究竟给它几多权数,这直接地体现着该项指标在一种体系之中的重要性及其作用;对此,社会学界的惯常做法是基于前人的经验、基于当权者的决定、基于大众的意愿……这如此多的介入,一言以蔽之都是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

2. 社会指标体系是理论社会学进入社会应用阶段的契合点。我常常琢磨关于理论社会学与应用社会学的界限问题。就字面言,理论是一种架构,一种概念间的联系,一种逻辑的推演。我认为这是称得上理论的三大要素。如果能被认可,那么,我们来用这三大要素审视被称为应用社会学的著述。难道它们都不具备这三种要素?关于青少年犯罪、关于中国现阶段社会分层、关于社会问题与社会预警、关于失业与再就业……谁能说这些研究没有理论呢?那么,纯概念的研究与可操作性的研究的区别何在呢?我想后者在于寓社会学的理论于现实社会的思考之中,或者换个说法,前者侧重文化、知识积累,后者侧重现实社会。于是可以说,社会指标体系即是由社会学理论转化为社会学应用的最重要的一种契合点、一种表现形态、一种机理的实现。应当承认,任何一个社会指标,都是一个概念或一种理论的数量化表现,但是,就针对某种社会病而言,单靠某一社会指标是很难甚至是不可能奏效的,原因并不复杂——任何

社会病之发生都是多种病灶引起的,它的诊治就需要综合性,即社会指标之间的内在关系性,这就需要社会指标体系,这种体系即是社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性,或称相关性。于是,可以进一步说,“契合点”之“点”实际上是一种“网”。如此可以又进一步说,社会指标侧重在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纵向关联的话,那么,社会指标体系所反映的侧重在社会生活中的横向关联。从确立社会指标及其体系的最终目的而言,从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应用功能而言,横向关联优于、重于纵向关联,这种关联也就是人们惯常讲的众多社会指标间的“变量”关系,这种关系是“网”,是体系,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应用上的契合点。

3. 社会指标体系是坚持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指示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要文件《发展的新战略》中认为: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一体的完整现象。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新的发展观更加突现了社会指标体系的重要作用——协调发展的指示器。任何一种社会指标体系的编制和确立,都是一种社会变迁的目标体系,或者说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进步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指标体系的指示器作用,集中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编制之初,它是着重于显现、反映社会发展的起步点。从理论家的模式,从政治家的职业感,从大众的需要,都要求社会全面发展。但是,从社会现实来看,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以至于每一个领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平衡,无论从静态还是从动态分析,任何一种社会指标体系的编制,只能从不协调开始。换句话说,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这不仅是社会发展自身的规律,也是展示社会发展的起点。二是在实践之中,它起评估和预警作用。社会指标体系是对社会生活各领域之间相关关系的量化体现,它是用“经验的材料”说话的,这就把人们对于协调发展的认识实证化了。社会生活中的每一方面对于社会发展而言,都重要,都不可或缺。这就有可能导致在一些社会管理者心目中“各吹各的号,越吹越重要”,而在社会指标体系的显示中,才有可能进一步统一人们对协调发展的共识,有益于人们及时地调整社会发展目标。

三、要重视对于主观社会指标的研究

所谓主观指标是针对客观指标而言的。社会指标及其体系的研究历史表明,一开初,人们并没有把社会指标明确地做主客观指标的区分。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学家们越来越感到,仅靠客观社会指标还不足以描述、解释一些社会生活中的“麻烦”,于是相继有人提出关于主观社会指标的概念。明确而集中地阐述这一概念的,当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的文件,它在其中说到:社会指标是观察资料……这类信息在下述意义上可能是客观的,即它打算表明的是什么状况和正在怎样的变化;在下述意义上也可以是主观的,即它打算表明的是组成社会的不同集团怎样看待客观状况及其变化。没有理由认为必须把同一现象的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合并在一起,因为人们的爱好、态度和标准是会变化的、相互矛盾的。^①中国学者对这两类指标有如下的解释:客观指标亦称非感觉指标,是反映客观社会现象的指标。如反映社会条件、社会环境、社会问题,甚至包括人们的社会活动等的数字或比例关系。主观指标则是人们对客观社会现象的感受,所以也称感觉指标。它表现为人们的心理状

^①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第71页。

态、情绪、愿望和满意程度等。例如人们对住房、交通、环境和公共安全等的满意程度等。^①从调查研究者的设计、操作而言，客观指标体系较之主观指标体系来得相对便当一些，而对所谓“满意程度”的社会指标的设计和调查则要相对困难一些，正所谓人心难测，也正因为它是人心，再难也要“测”。为此，我倡言，从事应用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在中国社会发展到现今状况之时，尤其要重视对于主观社会指标的研究、设计、调查。其理由如下：

1. 主观社会指标是社会变迁的终极目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或称社会的全面发展，这种社会发展的指向是全方位的，它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道德的、人际关系的、公共安全的等等。无疑，要推进社会发展，就要顾及这方方面面。其中尤其要以经济为中心，它是任何社会变迁的物质基础和最根本的支持前提。人，是社会变迁、发展经济的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用哲学的语言讲，人是物化世界的动力。这里，对于物化了的客观世界而言，人是手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在这一过程中，没有消费，没有享受，没有自身的再生产，只是自觉程度不同而已。我们所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也是一种自觉的社会变迁，但是，这种变迁超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它的根本目标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换言之，社会变迁的目的是人。这是社会变迁的最高价值、终极目的。

人是目的，就意味着要尽可能地满足人的物质的、精神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交的种种需求。而这种需求的满足程度，对于个体而言，则是内心的“满意程度”。这种“程度”的社会学量化表现则是主观社会指标体系。于是，可以这样说，重视这种指标，就是重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的一种学科化的表现。

2. 主观社会指标是社会动员的深层尺度。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的社会变迁，无疑地都伴随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动员——最大限度地吸引公众参与社会变革于其中。人民满意不满意——这是归根结底决定社会变迁成败与否的因素。那么，面对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的人民，是否被动员起来了呢？这种动员的深度如何呢？尽管这种动员可以是政治的，可以是经济的，可以是文化的，但归根结底是心理的、最深层次的社会动员，而主观社会指标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心理的实证参数。对于中国人而言，如果说，政治上是一次解放，经济是又一次的“解放”的话，那么，对于开始富起来的国人而言，精神的、社会心理的追求则是又一次更深层次的解放——尽管它是依政治经济的解放为前题条件的。这是社会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追求的研究，不仅是社会学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深化应用社会学理论自身所必须。举个例子说，“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是当下社会心理的一种带夸张又具有形象的说法。自1978年以来的社会改革，给大多数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可同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满意”。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最深层的原因正是社会价值观在起作用。换言之，人们在政治上解放、经济上温饱之后，更高的要求是社会服务的质量，以及它们在人心上所产生的效应——主观社会指标便是这种效应的数量化表现。

更应该重视主观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这是本文的归宿。

1997年3月26日初稿

1997年6月5日改定

责任编辑：张宛丽

^① 郑抗生等著：《社会指标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